

编辑忆旧

赵家璧 著

中华书局

赵家璧先生(1908—1997),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现代出版家、编辑家。上世纪二十年代末进入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四十年代辗转于桂林、重庆、上海,先后主持良友复兴图书公司、晨光出版公司,对新文学出版事业贡献良多。数十年编辑生涯中,他编辑出版了大量优秀社科文艺著作。其中,蔡元培撰总序,胡适、鲁迅、茅盾等十人参与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堪称新文学奠基期的总结性巨著,影响深远;老舍的《四世同堂》、钱锺书的《围城》等图书更是家喻户晓,进入现代文学名作之林。

赵家璧先生晚年发表了一系列“编辑忆旧”文字,受到读书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这些文字,有的散见于报刊,从未结集成书;而结集成书者,也已多年未曾再版。值赵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们策划编辑了赵家璧“编辑忆旧”三种,于近期陆续印行,作为对这位老出版人的纪念。三书情况分述如下:

《编辑忆旧》,据三联书店一九八四年初版重予录排,酌作校订。

《文坛故旧录:编辑忆旧续集》,据三联书店一九九一年初版重予录排,酌作校订。

《书比人长寿:编辑忆旧集外》,搜集作者上述二书以外的相关文字及序跋编订而成,为首次出版。

三书的出版,得到赵家璧先生的子女与上海鲁迅纪念馆“朝华文库”的大力协助,在此谨致谢忱。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〇〇八年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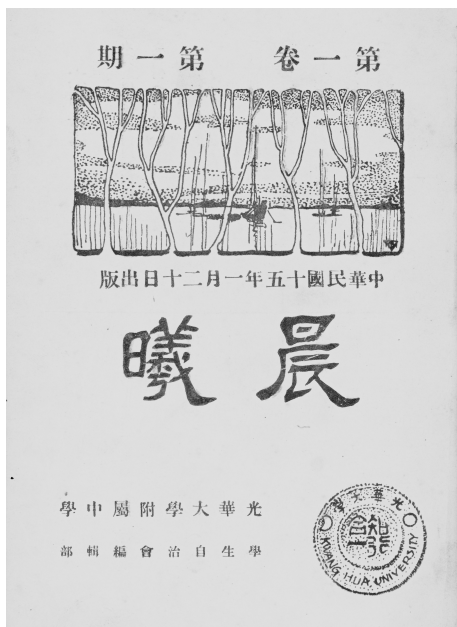
一九二二年我进松江县立第一高小，国文老师王者五见我喜爱看书，就把教员办公室书橱里几包多年来尘封未动的《新青年》、《新潮》，一本一本地借给我带回家去。这使我第一次接触到定期刊物这一出版形式，并从中吸取了许多新思想；更为我打开了知识宝库的大门，发现课本之外还有一个极大天地。接着我便常去离家不远的松江县立图书馆，借阅新文艺小说和《小说月报》、《学生杂志》等。正巧这两年暑假，由共产党员侯绍裘担任校长的景贤女中，假图书馆大礼堂办了两期暑期学术演讲会^①，应邀来松演讲者有恽代英、陈望道、邵力子、杨贤江、沈雁冰等，我和几位小朋友都去听了。当时说不上听懂多少，至多只能说是一知半解，但对最后两位演讲者印象甚深，因为我已从《学生杂志》和《小说月报》的版权页上，知道他们分别是两种杂志的编辑。一九二三年，上海创办了《弥洒》，这本曾被鲁迅认为五四时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艺月刊，三位创办人中，赵祖康、钱江春都是松江人，胡山源正在景贤女中教书。这一刊物在小同学中广泛传阅，掀起了一阵热烈讨论的浪

^① 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第232页，1981年，人文版。1922年1月，曾出版《松江第一次暑期学术演讲会演讲录》，见翟同泰：《茅盾同志答问》，《文教资料简报》1981年6月，第13页。

潮,这一则因为它是我们松江人编的,二则赵祖康的堂弟就在我们班里。事过后,我就和同级好友夏侠(松江叶榭人,天资聪慧,可惜升入交大附中后因厌世自杀)商议,我们自己不也可以编个刊物吗?这种天真幼稚的想法,在王老师的同意下,在毕业前几月,居然用油印机编印了几十本分送级友。至于刊名叫什么,内容如何,完全记不起来了;但《弥洒》的出版,确实给了我长大了当个文艺编辑的第一个启示。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时,我已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读一年级。六月三日,美国校长卜芳济在全体爱国学生面前,竟不让升半旗为死难烈士致哀,强把国旗夺下,踩在脚底,一场反帝爱国的学潮爆发了。暑假后,离校师生五百余人在学生家长张寿镛、王省三的支援下,独立自主地建立起由我们中国人自办的光华大学暨附中,我就转入附属中学读高中一年级。全校师生弥漫着一股奋发图强救中华的爱国反帝热情。附中有学生自治会的组织,下设编辑部,出版附中校刊《晨曦》,我被推为四个编辑之一。一九二七年我升入高中三,第二卷起由我主编,我便大刀阔斧地把从教会学校带来的校刊都是中西合璧的

英文部分砍掉了。编排方法、封面设计和用纸都来了个大革新。虽是综合性刊物,重点放在文艺上。每期十二万字,由校内师生执笔,用白道林纸印一百八十页,加套色封面。每期印一千册,向校外公开发行。印刷成本除自治会经费外,不足之数,分别向同学家长所办工商企业兜揽广告,以资弥补。这三年,我利用课余时间写了一些文章,除发表于校刊者外,也投向《小说月报》、《学生杂志》和《申报·艺术界》等。校刊的清样,我自己上浙江路华丰



一九二七年最早参加编辑的《晨曦》书影

印刷所校读；书出版后，我们几个同学一起踏车去本市分销处送货。眼看手写的文稿，一旦排成铅字，顿时变了样；再印在白纸上，加上一个漂亮的封面，订成本本，送到众人手中，就被赋予了一种独立的生命，在社会上起着它自己的作用。这个奇妙的过程，大大地吸引了我这个中学生；感到我的一股劲，从此有了使处了。直到今天，我的书柜里还保藏着两卷合订本《晨曦》，想不到它已成为我漫长的编辑生涯的起脚点，更增加我对这一纪念物的爱抚和珍惜。解放后，上海文艺出版社把它编入《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①，这是我所没有想到的。

我从附中毕业是一九二八年夏。这年春，我代表附中毕业生参加大学毕业生组成的《光华年刊》编委会，让我当印刷主任。通过一位广东籍同学的介绍，第一次去北四川路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委托代印，一谈就谈拢了。这家别具一格，专营画报、画册和电影歌曲的新型出版机构，华侨投资，实力雄厚，备有新式印刷机，颇具规模，经营作风也正派。中国出版史上被称为第一本大型画报的《良友》画报，远销全球华侨社会，是他们的一面旗帜。创办人兼总经理伍联德，广东台山人，岭南大学读过书，曾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儿童读物，为人热情豪爽，胸襟开阔，是一位具有爱国心、正义感的新型企业家。年刊印刷任务被接受后，我经常往良友跑，和伍联德一见如故，有很多共同的语言。年刊印成前夕，我向他告别，大家都有不胜依依之感。言谈间，我随便问他：“你们出了各种画报，如体育的、妇女的、电影的等等，为什么不出一种专给大学生看的呢？”他想了一下，就说：“你写个书面计划来吧！”九月中大学开学，有一天，他忽然驾车来校找我，说计划很好，邀我半工半读，立刻去担任编辑。这样的好运气，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但自问究竟不过是个大学一年生，决不敢独自去冒这个险。随后由伍另聘明耀五任主编，我任助编。一九二九年一月，《中国学生》月刊创刊了。可惜内容与我原计划的不同，销路呆滞。第二期起，明耀五辞职，去汉口教书，伍联德推我上台，就这样一直编到大学毕业前一年——一九三一年。

这个刊物我是沿着良友所出画报的传统方法编，有一定的知识性，

① 第8页。此《目录》列入《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种》。

偏重于趣味,思想性很薄弱。那时,日帝魔掌已深入东北宝地,蒋介石提倡不抵抗主义,高喊“先安内后攘外”,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交相煎逼的苦难深渊。一九三〇年秋,学校里国民党特务学生挑起的一场学潮,我亲身挨到的拳打脚踢,大大地冲击了我那种不问政治的“清高”思想。一九三一年初,左联五烈士在龙华英勇牺牲;秋天,国民党反动政府颁布了《出版法施行细则二十五条》;反革命文化“围剿”随着在上海开始。四马路上的进步书店,正如鲁迅所说:“封闭的封闭,关门的关门,暗暗改换店主‘重复旧业’的也有。”而良友独处北四川路,却像世外桃源,什么风浪也刮不到它。我虽在大学里读英国文学系,自己喜欢研究美国现代文学,搞些翻译,写些研究文章,但平日接触到的国内外形势和阅读到的革命书刊,给了我更深刻的教育。例假日去四马路看看开明、北新和其他进步新书业的文艺出版物,开始感到当编辑就得当个有理想的编辑,出书就得出推动时代前进而有益于人民的书;回头看我去三年走过的道路,不免自惭形秽。再环顾新书业所遭受的迫害,使我对自己的前途提出了严肃的要求。再隔一年就要毕业,作为一个青年编辑,在这样一个大动乱的时代里,难道不能有所作为吗?良友过去也出版过三十多种文艺书,未受读书界的重视,我就暗自盘算:能否在这里另辟一条出文艺书的路子呢?如果得到伍联德的同意,就把《中国学生》停办,专编文艺书。伍支持我开始稳扎稳打,从小做起。于是售价一角的《一角丛书》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初开始出版。

这套综合性的小丛书,主观上争取多出文艺方面的。当时我认识的成名作家仅有同乡施蛰存,他第一个出来支持我。徐志摩正在教我英国诗和小说;陈梦家、何家槐等青年作家就是在徐志摩家认识的。小丛书出了几种,反应平平。不到一个月,“九一八”事变突然爆发,接着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国内风云,瞬息万变。我意识到组稿工作再打不开,便无法满足大时代激荡下万千读者的迫切要求。正在我彷徨苦闷的时刻,创造社老将、左联重要成员郑伯奇来到良友编辑部,他开始为《良友》画报写国际述评,随后主编《电影画报》和《新小说》。他的到来,真似天上降下了一颗大星星,照亮了我

前进的道路,也使我懂得了革命的道理。暑假毕业后,伍联德把我留下,接受了我的要求,《中国学生》停刊,给我一个出版部主任名义,专管画报以外的编辑工作。当时《良友》画报销四万份,是全国销路较大的刊物之一,总编辑先是梁得所,后由马国亮继任,另有助编三四人。其他画报和刊物都由一人负责。我从此时起,在伍联德的放手信任下,也单枪匹马地去闯个新天地了。

巴金同志《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成立三十年而作》的文章中说得完全对:“我过去搞出版工作,编丛书,就依靠两种人:作者和读者。”^①但对那时的我而言,前者比后者更重要,因为我是否能在这个公司里留得下去,实现我的理想,就靠我能否找到受读者欢迎的作者,所以“作者是我的衣食父母”这句话,对我来说,是千真万确的。那时,来了郑伯奇,我的胆子更大,我的编辑思路更活跃了。组稿局面既已打开,作者队伍迅速扩大。这五年多时间里,我能够编辑出版不少好书,第一要感谢支持过良友事业的许许多多作家同志们。

最早为《一角丛书》写稿的左联作家,有丁玲、阿英、周起应(周扬)、沈端先(夏衍)等,这套丛书共出八十种。一九三三年初,新创《良友文学丛书》,事前,由郑伯奇陪我去谒见鲁迅。鲁迅听我说愿意把文艺编辑作为自己终生事业时,他老人家亲切地鼓励我:“这是一种非常需要而且很有意义的工作,我自己也是搞这一行的,其中也大有学问啊!”过了不久,《良友文学丛书》就以鲁迅的两本译作开了头,接着茅盾、巴金、老舍、郑振铎、叶圣陶、沈从文、张天翼等著名作家的手稿源源不断地到了我的手中。一九三四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编辑过程中,由于鲁迅接纳了我的请求,收回成命,继续编选,才不致功亏一篑。这些往事,我都已写入《编辑生涯忆鲁迅》中。最近我把此书赠送给叶圣陶老先生,他给我复信中说的几句话,作了实事求是的评语。叶圣老说:“鲁翁毕生致力于编辑极勤,主旨唯在益人,其于良友,即已尽力不少,信可感念。”

就在这一段时期里,我又编辑了《良友文库》、《中篇创作新集》、《苏联童话丛书》、《万有画库》、《世界短篇小说大系》和《徐志摩全集》等成

① 《解放日报》,1982年7月1日。

套书；最后两套，因故未能与读者见面。此外单行本也出了不少。我从实践中逐渐认识到，编辑工作不仅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而已，有些书也可以说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创造性劳动。如果出了好成果，不但能推动革命，传布文化，保存下去，世代相传，也能为国家民族的文化事业做些积累的工作。

三十年代因组稿关系认识的作家，在以后的岁月中，不少人与我建立了友谊。特别有几位著名作家如郑振铎、老舍、巴金等，在我此后数十年历经磨难的编辑出版生涯中，分别给予我终身难忘的鼓励和种种帮助。就靠这种雪中送炭的温暖的友情，才使我一直站在文艺编辑这个光荣的岗位上，没有退却，没有掉队。编辑和作者，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结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最近，《新文学史料》总第十四期刊出郑伯奇遗作《左联回忆散记》，有一段话提到我。他说：

“一·二八”事变以后，我应聘去作良友图书公司的编辑，我化名郑君平，不久身份就暴露了。好在这家书店以前是不问政治的，特务虽然来侦询过几次，我都躲避开了，店方也还应付过去。那时候，赵家璧同志刚从大学毕业，富于事业心，对新事物很敏感，对人也很热情。我们彼此有了相互了解，便着手商订《良友文学丛书》和《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计划。在组织稿件方面，他奔走出力最多，因为有些作家，我是不便出面，也不愿意去见的。不可否认，这些丛书的内容并不令人十分满意，作者的名单也比较复杂，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的计划颇受读者欢迎，书店由此得到鼓励。

遗文末段所提的批评，完全符合当年的史实。因为如果不那样做，良友作为一个主要出版进步文艺书籍的据点，在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中，是不可能存在下去而不遭破坏的。今天回顾，从另一角度来看，组织不同流派作家的作品出版，对今天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工作者，倒也有一定的好处，至少可以了解当年文艺界的全貌，也保存了一些有用的甚

至是有益的资料。当时良友组稿的面是广的,但也并非广大无边。

回想三十年代许多著名作家乐意把自己的心血之作交良友出版,还有一条至今为作家朋友们所津津乐道的,那就是良友书籍装帧好。我们的文艺书极大部分是布面或纸面精装,有的外加封套封腰,许多书用米色道林纸印,这就深得作者的欢心。张天翼的《畸人集》,共有八百页,布面精装一厚册,包封正面印上作者近影,底面介绍作者另外两部新作。当年天翼拿到样书时,逢人便夸说这部书:“我的书第一次穿上西装,看多美啊!”可惜他所藏样书,十年浩劫中丢了。去年我去青岛开会遇见沈承宽同志,她说,天翼非常想念这个本子。她知道我手头还有,便托我照个书影给她。据说,病中的天翼见到这幅照片,还是高兴得合不拢嘴。这类装帧,鲁迅生前曾戏称它“良友式”;主其事者是左联成员汪汉雯,他经张天翼介绍,来良友负责文艺书的美术装帧设计,是我唯一的助手。



张天翼作《畸人集》精装本书影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战爆发,良友所在北四川路陷入战区,公司经理(伍联德早已辞职)把能赚大钱的《良友》画报迁往香港,向香港政府登记出版。留在上海的职工全部被解雇,我也失业了。从童年时代就作为自己追求的理想——当一个文艺编辑,经过约十五年的个人奋斗,终于得到了实现;这时又告中断了。但我并没有灰心丧气,我要把这个辛苦经营、略有建树的据点重新建立起来,那就是一九三九年在上海

海成立的良友复兴图书公司,我仍然负责文艺编辑。因篇幅关系,不属于本文范围之内了。

编辑是一门学问。解放后不久,罗竹风就提出:编辑是杂家,在我国古已有之。最近郭绍虞说:“学有二,有个人专攻之学,有社会通力之学。”^①后者就指编辑学吧。《书林》编辑部约我为“治学篇”栏写稿,此文怕不合规格,因为我仅把它写成又一节《编辑忆旧》而已。

1982. 7.

(原刊于《书林》1983 年第 1 期,上海人民出版社。)

① 郭绍虞为《萝轩变古笺谱》所作序,《上海文学》1981 年 9 月号。

使我对于文学逐渐发生兴趣的第一部书，是刘韦士·卡洛尔(Lewis Carroll)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Alice in Wonderland*)。

大约是十三岁那年，正在乡间的高等小学里念书。偶然地在学校图书室里《少年杂志》的广告上，看到一部叫做《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童话的出版，说是欧美的小孩子没有一个不读过，更没有一个不喜欢它。于是写了一张邮政片给正在上海学医的六叔，要他到商务去买一本回来。在我的童年时代，六叔是最爱我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一本黄书面黑框子的童话，便如我所愿般地从上海带回来了。

第二天，我便依次地读下去。第一篇当然看赵元任先生的“译者序”。接连地念了两遍，却不知道译者说了些什么。既知人家不要看序，序却依然写下去；既说排版的人不必把这篇序文列入，事实上序文却依然印在那里。简单的头脑，像给他绕了几个圆圈一样；有些不知所从的感觉。于是我对于这部书先前所抱的奢望，顷刻间被这一篇文章打得粉碎了（这一篇译者序，在译者是有意识模仿刘韦士·卡洛尔那种“滑稽”而“不通”的笔法，可是我至今觉得译者是有些东施效颦的）。

译者序虽然使我失望，但是他所说“说来说去还是原书最好”那句话，我是懂得的。书末所说“我已经说最好是丢开了附属品来看原书，

翻译的书也不过是原书附属品之一，所以也不必看”，更使我想到译者既说译书不必看，而他又说过欧美的小孩子都看过，我已是十三岁的大孩子，为什么不去买一本原书来翻着字典念呢？于是从序文里把英文书名抄下了，等又一个星期六叔从上海回来，我就要他买一本原文。当时他虽然表示过我我不应当如此不自量力，但是四天以后，一本麦美伦袖珍本的 *Alice in Wonderland* 从邮局里寄来了。我在书内第一页上用钢笔谨慎地写上自己名字时那种不可名状的高兴，至今还能够体味到。这一部书，便在《英语模范读本》以外，成为我自己所有唯一的英文书。也从这一部书里，引起了我对西洋文学的趣味。

我童年生活的苦闷，比阿丽思所遭受的更厉害。既没有兄弟姊妹，母亲又把我管束得不许出家门一步。但是在辛苦地读着《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时光，训练成了一种超脱实际生活的想象力。像跟了红眼睛的白兔子，钻入了另一个世界一样，游过了眼泪池，参加了疯茶会，倾听着素甲鱼的诉苦，而自己也逐渐地做起白日梦来。虽然像阿丽思的姊姊般同样明白只要把眼睛一张，就样样会变成平凡的世界，那些茶碗的声响，会变成羊铃的声音，那皇后的尖喉咙，更会变作牧童的叫子。可是我就从这部书里，发现了另外一座天地；也从这一部书里，我知道除了教科书以外，有许多书是能引起我更大的趣味的。

就是这本麦美伦袖珍版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成为我今日自己有限的藏书室里最先的一部。

1934 年

（原刊于郑振铎、傅东华编《我与文学》，1934 年，上海，生活书店。）

当《书讯》最初约我为“我和图书”栏写稿时，我立刻想起三十年代生活书店出版的《文学》创刊一周年时，该刊编辑郑振铎和傅东华合编了一部征文纪念特辑《我与文学》，我当时曾投寄了一篇，题名《使我对文学发生兴趣的第一部书》。文中叙述了当我在松江县立第一高小念书时，赵元任译的世界著名童话《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怎样第一次打动了我的童心。去年春，报载这位八十余高龄的赵元任先生，思乡心切，自海外回国探亲，受到党中央和学术界的热烈欢迎。我又一次记起，就是这位语言学家，第一个启发我去试探世界文学的宝藏。

一九二五年进入光华附中时，又一本西洋文学名著原本吸引了我，那是王尔德的《陶林格莱肖像画》。我在课余写了一篇万余字的读书札记，潘序祖老师帮我修改润饰，还写了短序，慰勉有加，先发表在校刊《晨曦》上。一九二七年重加整理，投寄给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出乎我意外地被录用发表了，成为我在社会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这件事，大大地增加了我对读书的兴趣，有时也梦想，将来自己能否也成为作家呢？一九二八年升入大学，在徐志摩先生的指导和影响下，闯入了西洋文学宝库的大门，而引导我对欧美文学作广泛涉猎的是几套有名的国外出版的文学丛书。当时我已在良友图书公司当编辑，

半工半读,写些文章还有稿费可拿。手头一有余钱,就往南京路外滩几家西书铺跑,那里开架陈列着各种不同名目的成套文学丛书,开本装帧统一美观,售价也较原版本低廉。其中最逗我喜爱的是一套软皮面精装袖珍本的《近代丛书》(Modern Library),收有近百种古今文学名著,选目精练。售价一律美金九角五分,方便读者;各书均按出版先后循序编号,《陶林格莱肖像画》就是第一种。我当时决心配购全套,新书买不到,就向各家旧书店找。当我阅读之余,抚摸着这一套整齐美观的丛书时,真有爱不释手之感。当时我们自己出的文艺书都是白报纸印纸面平装本;我在想,出版文艺读物,除了要求内容美以外,在出版形式上,是否也应当给读者以一种美的享受呢?

一九三二年大学毕业,良友公司总经理要我专管文艺书的编辑工作,我就有机会实现我的理想了。我就在出版形式上仿照《近代丛书》,从一九三三年起创刊了《良友文学丛书》,用软布面精装,外加彩印封套,书页选用米色道林,各书篇幅自二百页至四百页,售价一律九角,各书也循序编号。此外,还提前发行编号作者签名本一百册。这套丛书,在鲁迅、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张天翼、施蛰存等著名作家的大力支持下,到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共出了约四十种,另加特大本四种。现在已被文艺书爱好者或收藏者视作难以觅购全套的珍本了。

从这套丛书起,我从爱读书成为爱编书。随后又进一步认识到编辑成套丛书,不能仅仅满足于用统一形式,把作家已写成的作品,汇编编合在一个丛书的名目之下;更有意义的工作,还在于要把编书当作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劳动来干。如果先在编辑头脑里酝酿形成一个出版理想,然后各方请教,奔走联系,发动和组织作家们拿起笔来,为实现这个出版计划而共同努力,从无到有,创造出一套具有特色的丛书来;那么,一旦完成,此中乐处,就别有滋味在心头了。去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重版的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就是我当年在这方面的第一次尝试。

一九八二年元旦已经来临,我已活到了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三。回顾自己所走过的道路,读书、写书、编书、出书,几乎天天在和书打交道

中;而每个老知识分子,都可以写一篇他一生中是依靠怎样几本书的启发教育而逐渐成长的历史。青年人寻求知识,为国家四化作出更大的贡献,最主要的还在多读书!目前正在提倡精神文明,加速智力投资,书的重要作用显得更为突出了。我们的出版社更有责任要认真编好书,出好书;而编辑,这个光荣的工作,更是大有可为的!

1981. 12.

(原刊于《书讯报》,1982年1月10日,上海。应该报“我和图书”征文所写。)

我编辑过几套至今还为人所熟知的文学丛书，例如三十年代的《良友文学丛书》（47种）、《良友文库》（16种）、《中篇创作新集》（10种）等，和四十年代的《晨光文学丛书》（40种）等。这些丛书的作者中，极大多数已被写入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些书已成为作者一生的代表作或重要作品，被列入各种文集、选集，或继续得到一印再印的机会，有的还被翻译成世界各个语种，蜚声国际文坛。我没有编过文学期刊，对成套书，特别是文学方面的成套书，却在大学读书时代，早已心向往之；把将来也编几套文学丛书作为自己的理想，向这方面努力的结果，数十年来终于略有所成。这主要依靠许多前辈作家的热情支持。当年怎样迈出了第一步，以后又怎样会得到这么多左翼作家和进步作家对我这个文学青年的信任和帮助，还应当从头说起。那是一九三一年，距今已半个多世纪前的旧事了。

—

那一年，阵阵乌云笼罩着神州大地，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交相煎逼的苦难深渊。国民党反动派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退让，对上海的革

命的和进步的文艺界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年初，左联五烈士在龙华英勇就义；接着鲁迅被迫离寓避难。入秋，无理查禁了二百二十八种进步书刊，又颁布了“出版法施行细则二十五条”。四马路上进步的中小书店，有遭封闭的，有自动停业的；能维持下去的，对出版进步书刊也等待观望。官办的书店门可罗雀，刊物印了没有读者。那真是文化遭难、书业凋零的年头。但我当时已在那里工作的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却还如世外桃源，什么政治风浪都吹打不到它。

这家国内最早以公司命名的书店，是广东台山人伍联德于一九二五年七月集资创办的。他看到国外图文并茂的新型刊物，如美国的《星期六晚报》、英国的《伦敦画报》等，便跃跃欲试。当时上海市上已风行单张四开画报，他先办良友印刷公司，以承印这类小报式画报为主要业务。一九二六年一月首创《良友》画报，这个大型八开本的现代化画报，现在已被公认为中国出版史上的创举，也为良友公司以后的出版事业打下了基础。一九二七年一月，租下北四川路上的双开间铺面和后部工厂办公室房屋，扩大业务，增出体育、妇女和电影三种画报，改称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当时国产电影开始抬头，美国的有声电影正在上海不断上映，新出的电影明星画片和电影歌谱等，极受欢迎。北四川路蓬路（现称塘沽路）口的大玻璃橱窗里，挂满了用美女做封面的各种画报和画片，琳琅满目，吸引着过路行人。《良友》画报行销世界各地华侨社会，是国内唯一能赚大量外汇的出版物。当时印刷设备已大加扩充，仍然兼营承印业务。我就在一九二八年春，为了委印《光华年刊》而与良友发生了最早的接触。那时大学毕业班，按照教会大学的传统，都要编印一本印刷装帧极为精美而内容全是戴方顶学士帽的个人像和各种各样团体照的纪念册，名为年刊，由大学毕业班组成编委会。因我在附属中学里已编了三年校刊《晨曦》，这年是中学毕业生，被认为熟悉印刷业务，选我当印刷主任。在一位广东同学的介绍下，拿去交良友承印；我就经常往良友去看图版样，校文字稿，慢慢地就与伍联德见面谈天了。他是一位热情坦率、心胸宽广的年轻企业家，对图像出版事业怀有极大兴趣，为人有胆识，有魄力。我和他一见如故，有许多共同的语言，很快